

在中國,竹子上刻字、岩洞里題字、城牆上留字,自是文人雅士的習慣。古代文人寫詩,題目常常愛寫成“題××壁”“題××廟”。“不識廬山真面目”是蘇東坡刻在廬山西林壁上的,“兩山排闥送青來”是王安石刻在朋友湖陰先生房子的牆壁上的。幸虧水上不能寫字,不然估計“疑是銀河落九天”就被李白寫到瀑布上去了。在國人耳熟能詳的《西遊記》里,孫悟空在佛祖的中指上寫道“齊天大聖到此一游”,還在拇指上撒泡尿,成爲壞樣板,爲中國孩子上了一堂別開生面的啓蒙課。

美國孟菲斯大學歷史系教授孫隆基有一個有趣的觀點:國人缺乏公共空間的基本禮貌的原因在於對嬰兒排泄習慣的訓練太過隨便。按照中國的傳統習慣,一般讓小孩子穿“開襠褲”,可以隨時隨地大小便。受這種教育長大的人,當衆擤鼻涕、挖鼻屎、搓身上的汗垢,在人群中放屁,吃飯時將骨頭吐在桌子上,把公共場所當作隨便可以丟垃圾的地方,不守時間,不守規則,對身體的多餘動作不去控制等,就都不奇怪了。

“將‘糞便’任意地倒人客觀世界的傾向還包括:在公共場所動輒毫無節制地將怒氣和敵意發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種克制不住的侮辱別人的沖動。”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如此寫道。

現在,華人舞蹈隊在紐約十分活躍,凡是華人社區的大眾性活動或大型活動,中老年舞蹈



中國人的旅遊觀

作者:馬帥

隊的身影都會出現,爲中外民衆送去腰鼓表演、傳統舞蹈。平日裏他們就在布魯克林的日落公園里排練,但因前去該公園鍛煉或跳舞健身的華裔民衆越來越多,且華人大多喜愛在音樂的伴奏下大跳集體舞或交際舞,所以總是引來不堪這些音樂與噪聲騷擾的公園周圍居民的抗議與抱怨。結果是,有警員前來將帶頭者銬起來並開出傳票,被訴者不得不出庭應訴。

可以說,“佔領公共空間”在外國人看來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抗議的力量,但在中國人看來,不過是日常習慣的一種而已。

學者朱大可認爲,中國人缺乏公共空間的基本禮貌,肆無忌憚地大聲喧嘩是其中一種表現。此外還有碰撞別人後毫無反應,更不會致歉;在車上哄搶座位,拒絕給老人和孕婦讓座;隨地吐痰和小便,吃飯時大聲咀嚼。

但這些在中國幾乎是約定俗成的規矩,在大多數國人看來,並不覺得不妥。每年杭州西湖都有許多遊人會把腳伸進湖中,杭州市西湖風景名勝區管委會認爲:“這從側面說明瞭西湖水質好,大家願意親近,我們挺欣慰的。”支持此行爲的一些人認爲,動輒責怪“國人素質低下”緣

於自卑。沒必要一遇到事情,就拿國民素質低來說事兒。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一場自上而下的生活習慣改良運動漸次在中國大地展開。與1952年的“愛國衛生運動”和1981年的“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甚至1934年至1949年間,“中華民國”政府推出的“新生活運動”相比,以往都是中國社會內部的運動,而這一次則是因爲國際交往而起,它可以與提陞現今中國國家軟實力、提陞國際地位相提並論。

至於誰在抹黑中國遊客,涉及對文化的尊重與瞭解,遊客的品位、消費習慣,以及民族情感的好惡,實在過於複雜。從筆者採訪得到的數據而言,中國年輕一代的情況優于前輩,因爲受過良好教育,出生在殷實地區的人居多。

類似的例子可以從鄰邦的日本人身上看到: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現代警察之父”川路利良曾被派去法國考察,他在坐火車的時候出恭,按照日本國內當時的習慣,他用報紙包着大便丟出了窗外,結果砸中一人,大出洋相。可時過境遷,隨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深化,日本人成爲各旅遊國家最受歡迎的遊客。

即便如此,日本人依然在反省,他們認爲,他們在國外過度親切,那些習慣性帶着的,卻沒有眼神交流的微笑,總會招來歐美人的反感。(黎青圖)



不快樂也要工作

理論上來說,隨着生產效率的提高,人們的工作時間可以變得越來越少,會用更多的時間去享受生活。但是,事實上沒人這樣做。科學進步並沒有縮短8小時工作制和延長休息日。

美國的《心理科學》雜誌發表的一項研究試圖解釋原因:人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本能,會去努力賺取遠超自己所需的東西,哪怕這種不平衡會令人“不快樂”。

科學家們構建了一個實驗來探索物質積累對人的誘惑。在第一階段,受試者需要在一台帶耳機的電腦前坐5分鐘,選擇聽一段悅耳的音樂或是一段煩人的白噪音(一種很吵耳的沙聲——編者注),如果你能聽完特定時長的白噪音,便可獲得一塊巧克力。一部分受試者被告知,只需要聽較短時間的白噪音就能得到巧克力,這部分人

被稱爲“高收入者”,而另一部分“低收入者”則需要聽較長時間的白噪音,才能獲得一塊巧克力——聽白噪音象徵努力工作,而巧克力則意味着“工資”。“高收入者”被設定成工作效率更高的人,“低收

入者”則反之。第二階段,科學家告訴受試者,要當場吃掉獲得的巧克力,吃不掉的將被收回。

結果,“高收入者”平均賺取了10.74塊巧克力,雖然事實上他們只能吃掉3.75塊。研究者這樣形容這種情況:“這是一種‘盲目的積累’,明知道是浪費精力,但人們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

由於規則的緣故,“低收入者”並未賺得超出自身需要的巧克力,但他們也在努力地聽白噪音,聽的總時長和“高收入者”並無差別。

當然,在真實的世界里,人們賺取的是錢而不是巧克力,也沒有工作時間的限制,但研究表明,即使知道明確的界限(吃不完的巧克力不能拿走),人們依然會努力賺取自己根本用不完的物質。

走進台北,最先映入眼帘的要數101大樓。它確實宏偉壯麗,如果寶島是一片綠葉,它就像那可握的葉柄,無愧爲太平洋西岸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識。不過,你心里想的則可能是腳下正在走的路。台北的路橫平豎直,格局和六朝古都南京基本相似,但除“中山路”“武昌路”外,幾條主要街道都以“仁愛”“忠孝”“信義”“和平”命名。此外,還有“四維”“八德”等路名,這在大陸乃至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

時值深秋,街面仍然綠意盎然,樹影婆娑,全然沒有凋零飄落的景象。四面環海的獨特地理環境,讓你盡享清風撲面,絕無霧霾的侵染。更吸引人的,還是路旁的商鋪,店牌清一色用繁體字書寫,讓你不僅感受到現代都市的東方色彩,還能領略到華夏文明的傳承。繁體字的字形和構義與簡體字大異其趣,更接近自然,如“日月水火山石田土”,承載着炎黃子孫對漢字構成的共同記憶。特別是繁體字在這裡——不是在圖書館、博物院的留存,而是在田野和路旁的自然生長,讓你近距離地體味到她的美麗、魅力和神奇。正如隨行嚮導所言:“如果愛沒有心,那還叫愛嗎?”

台灣的路名,關鍵字都出自“四

書”“五經”,孔孟之道在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由此,台灣的路名作爲一種文化現象就不是一種孤立的存。任何一個有獨立地位、有影響力的民族都以文字駕馭文化,以文化主張思想。如果說“方塊字”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文化,那么與之對接的則是經典的儒家思想,我們這個民族是包容、融匯、接受的民族,同時也是一個獨立、選擇、堅守的民族。在學說遍地、主義紛呈、價值多元的當下,誰

要先下,不會說“讓一下”,而是說“借個路”。文化有時說大也大,說小也小,大處是一種弘揚,小處就是一種自覺。

有人說台灣將傳統文化“鋪在了路上”,其實鋪這條路就像台灣修築中部跨山涉水、橫貫東西的公路一樣,同樣付出了艱辛。正是有了鋼鐵和文化橋樑的同步構建,中華文脈才得以在台灣的青山綠水間流淌。爲了增強民族認同和民族自信,台灣把國文作爲文化教育的根基,中小學國文、歷史和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佔了一半,而“禮義廉耻”幾乎是各個學校共同的校訓,儒家學說受到特別推崇,“讀書知禮”成爲經久的時尚,夜晚的誠品書店人流如織、書香流溢。

說來也巧,我自台灣歸來之時,正值習近平總書記到山東曲阜孔府考察,在孔子研究院翻閱《孔子家語通解》和《論語詮解》時,他說:“這兩本書我要好好看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以中國文化發展繁榮爲條件,沒有任何一種元素能像文化那樣具有強大而持久的民族凝聚力。文化滅,則精神滅;文化殤,則中華殤;文化強,則中國強。中華民族歷經五千年發展,就是因其文化的綿綿不絕。以儒家文化爲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兩岸同胞共有的名片,而在“仁義”和“忠孝”的路上,我們還要攜手走向更遠。



問“禮”路上

作者:完顏平

也不能否定“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價值取向,甚或不得不承認其是現實的“普世價值”。路就是一面鏡子,禮在路上,每個路人的舉止,都是民族文化的寫真。在台灣,任何一個十字路口都沒有“現在是紅燈,請不要闖紅燈”的提醒,但誰也不會闖紅燈,而且不會不走斑馬線。後面的人要超越前面的人或在電梯里

有玩笑說,中國文化只剩下了個“吃”。如果以爲這個“吃”是爲了中國人的胃,那就錯了。這個“吃”,是爲中國人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的,即所謂的“色、香、味”。

在嘴巴這一項里,除了“味覺”,也就是“甜、咸、酸、辣、辛、苦、膾、腥、麻、鮮”,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口感”,所謂“滑、脆、黏、軟、嫩、涼、燙”。

我當然沒有忘掉“臭”,臭豆腐、臭鹹魚、臭冬瓜、臭蠶豆,之所以沒有寫到“臭”,是因爲我們並非爲了“逐其臭”,而是爲了品其“鮮”。

……

小的時候,長輩總是告誡我們不要挑食,其中的道理會影響人一輩子。人還未發育成熟的時候,蛋白酶的構成有很多可能性,隨着進入小腸的食物的種類,蛋白酶的種類和結構開始形成以至固定。這也是例如小時候沒有喝過牛奶,大了以後凡喝牛奶就拉稀瀉肚的原因。我是從來都拿牛奶當瀉藥的。亞洲人,例如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到了喝牛奶多的地方,例如美國,絕大多數都出現喝牛奶即瀉肚的問題,這是因爲亞洲人小時候牛奶喝得少或根本沒有喝過,因此缺乏某種蛋白酶而造成的。

分析起來,我從小就不吃臭豆腐,所以小腸里沒有能分解它的蛋白酶。我十

幾歲時去內蒙古插隊,開始吃奶皮子,吃出味道來,所以成年以後吃發酵得更完全的奶酪,便沒有問題。

長輩“不要挑食”的告誡會影響小孩子的將來,道理就在于你要儘可能早地、儘可能多地吃各種食物,使你體內蛋白酶的構成儘可能完整。於是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什麼都能吃,什麼都能消化,也就有了幸福生活的一半了。

所謂思鄉,我觀察了,基本是由於吃了異鄉的食物,不好消化,於是開始鬧情緒。

我注意到一些會寫東西的人到外國走了一圈,回到中國之後發表一些文字,常常就提到對飲食的不適應。有的說:“西餐有什麼好吃?真想喝碗粥就鹹菜啊!”

這看起來真是樸素、真是本色,讀者也很感動。其實呢?真是挑剔。

我就是這樣一種挑剔的人。有一次我從亞利桑那州開車回洛杉磯。我沿着十號州際高速公路往西開,早

上吃三明治,中午吃麥當勞,天近傍晚,路邊忽然閃出一塊廣告牌,上寫中文“金龍大酒店”,我毫不猶豫地從下一出口拐下高速公路。

其實我對世界各國的中國餐館相當謹慎。威尼斯有一家溫州人開的小館,我進去要了盤炒雞蛋。手藝再不好,一個炒蛋總壞不到哪裏去吧?結果端上來的炒雞蛋炒得比鹽還咸。我到廚房去請教,溫州話我是不懂的,但掌勺的人表明“忘了放鹽”我還是懂了。其實,是我忘了浙江人是不怕咸的,不過不怕到這個地步倒是頭一次領教。

好,轉回來說美國西部蠻荒之地的這家“金龍大酒店”。我推門進去,站櫃的一個婦人迎上來,笑容標準,以英語開口:“幾位?”我覺得有點不對勁,因爲從她肩上望過去,座位上都是牛仔的後代,我對他們毫無成見,只是,“您這裡是中國餐館

在回洛杉磯的路上我都在罵自己挑剔。波蘭師傅怎么了?波蘭師傅也是師傅。我又想起來貴州小鎮上的一家小飯館,進去,師傅迎出來:“你炒還是我炒?”中國人誰不會自己炒兩個菜?“我炒。”

所有作料都在竈台上,揀揀菜,抓抓碼,叮嚀五四,兩菜一湯,吃得頭上冒汗。師傅蹲在門口抽煙,看街上的女人走路,蒜瓣兒一樣的屁股扭過來扭過去。

所以思鄉這個東西,就是思飲食,思飲食的過程,思飲食的氣氛。爲什麼會思這些?因爲蛋白酶在作怪。

與我體內的蛋白酶相反,我因爲十多歲離開北京,去的又是語言不通的地方,所以我在文化上沒有太多“蛋白酶”的問題。在內蒙古、雲南,沒有人問過我:“離開北京的根以後,你怎麼辦?你感覺如何?你會有什麼新的計劃?”現在倒是常常被問道:“離開你的根以後,你怎麼辦?你感覺如何?你適應嗎?”我的根?還不是這里扎一下,那里扎一下,早就是老盲流了,或者用個更樸素的詞,是個老“流氓”了。

你如果儘早地接觸到不同的文化,你就不太會大驚小怪。不過我總覺得,文化可能也有它的“蛋白酶”,比如母語,制約着我這個老盲流。



思鄉與蛋白酶

作者:阿城

嗎?” “當然,我們這裡請的是真正的波蘭師傅。”